



賴永海 南京大學教授

哲 學博士，現任中華文化研究院院長、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鑑真圖書館館長等職位。學術成果上成績斐然，在海內外享有盛譽，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第一：專著宏富；第二：主編專業叢書和學術刊物；第三：積極參與相關學術活動，並於海內外學術刊物發表了近百餘篇研究論文。

主要著作有：《中國佛性論》、《中國佛教文化論》等十八部專著；主編全球首部完整的《中國佛教通史》、《佛教十三經》等。

現當代中國佛教何以走上人間佛教之路？

這次主要同各位一起探討兩個問題：

1. 現當代中國佛教為什麼會走上人間佛教之路？
 2.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為什麼會成為當代佛教中最具影響力的佛學潮？
- 對於第一個問題，可以先從歷史談起。

佛法東漸，原是大小二乘兼傳的，但是，小乘佛教在傳入中國之後，始終成不了氣候，且自魏晉以後，更是日趨式微；與此相反，大乘佛教自傳入中土後，先依傍魏晉玄學，後融會儒家的人性、心性學說而蔚為大宗，成為與儒道二教鼎足而三、對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產生著巨大影響的一股重要的社會思潮，此中之緣由無它，蓋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強調慈悲普度的精神，較諸小乘注重自利、單講自我解脫的思想更符合中國人的精神需要，更能為中國人所接受——這種現象正如歷史上有些思想家所指出的：一種思想的普及程度，決定於社會對這種思想的需要程度。大乘佛教之所以能夠盛行於中國，而小乘佛教在中國始終成不了氣候，這一歷史事實，至少給予我們這樣一個啟示：中國佛教的發展，不可能走那種封閉式的、注重自利、自了的小乘佛教，而應該是那種開放性、大眾化的注重利益他人、提倡普濟群生的大乘精神。

中國佛教史上還有一個重要的事實，即自隋唐之後，禪宗幾乎成為中國佛教的代名

詞，而深入地考察禪宗的思想，其最核心的東西當是把一切諸法包括諸佛與眾生都歸結於自心、自性。這一變化集中體現在惠能對傳統佛教的變革——「六祖革命」。

「六祖革命」的實質，絕不是改變某一佛教術語之稱謂，更重要的改變了此一稱謂的內涵。具體地說，惠能以人心、人性取代傳統佛教的自心、自性之實質，乃在於把佛歸結於人之同時，把人變成了佛。惠能之後的南宗傳人，更直言佛即是人，人即是佛，人佛無異。如果人們有機會去讀讀後期禪宗的「公案」、「話頭」、「機鋒」、「語錄」，更會發現，禪師們所苦苦尋覓的東西，原來都是那個「自家寶藏」，禪師們所說的「主人公」，實際上也就是他自己，而那些大徹大悟了的禪師，其最大的收穫，不外是發現原來「佛即是我」，「我即是佛」。此一情形唐代某尼之一〈悟道〉詩寫得最是生動真切、淋漓盡致。詩曰：「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隴頭雲；歸來笑拈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此謂翻山越嶺、踏破鐵鞋苦苦尋覓未著之佛，原來就是自個心性。

但是，中國佛教發展到明清時期，逐漸出現把佛教變成一種與人生了不相關的或是非人生的「超亡送死之教」，導致佛教與人生日隔，佛教自佛教，人生自人生，從而使佛教走上衰落、式微的道路，這種教訓是很慘痛和深刻的，當時的不少高僧大德及有識之士對此曾深有認識並提出過尖銳的批評，例如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就曾尖銳指出佛教之脫離、

遺棄人生乃是「致佛法不揚，為世垢病之一大原因」。

太虛大師對於佛教的改革，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把傳統佛教的脫離現實人生變成注重「人本」，他在《佛陀學綱》中就說：「現在講佛法，應當觀察民族心理特點在何處，世界人類的心理如何，把這兩種看清，才能夠把人心所流行的活的佛教顯揚出來。現在世界人心注重人生問題，……應當在這個基礎上昌明佛學，建設佛學，引入到佛學光明之路，由人昇華達到佛。小乘佛法，離開世間，否定人生，是不相宜的。」

在《救僧運動》一文中，太虛還明確指出：近代思想，以人為本，不同古代之或以天神為本，或以聖人之道為本。一般人多認為，佛教是非人生的，太虛認為，這是一種誤解，大乘佛法就其「本義」說，是「發達人生的」、「發達生命的完滿生活的」，是一種「究竟的人生觀」。太虛十分反對把佛教變成一種故弄虛玄的工具，而主張佛教應是為化導人世的實際生活而設的，任何一個學佛的人，如果不了解人生，不了解現實生活，即使他讀盡千經萬論，也無異於「賣櫝還珠」。基於這種思想，太虛認為，學佛應該先從做人開始。

所謂學佛先從做人開始，亦即學佛的第一步，在於首先完善人格，好生做個人，做個有人格的人。只有先成為一個完善的好人，然後才談得上學佛，若人都做不好，怎麼還

能去學超凡入聖的佛陀呢?!（詳見《佛陀學綱》、《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這些說法語言平實，但意蘊深刻，它把傳統佛教那種遠離人間、可望而不可及的佛教，直接植根於人生、直接植根於人的現實生活，改變了過去的佛教與人生脫節，佛教自佛教、人生自人生的形象，使人認識到只要在現實生活中做成一個完善的、有人格的人，然後再逐步向上，便可以「增進成佛」、「進化成佛」。他有一個著名的偈句，叫「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圓佛即成，是名真現實。」（《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可以說是對近代以人為本的人生佛教的一個精闢概括。

太虛大師的這一看法是很有見地的——道理很簡單，既然佛教遺棄了人生，人生必然也會遺棄佛教，而如果一種宗教失去了自己最基本的信眾，完全沒有了群眾的基礎，那麼又遑論傳教弘道呢？

以上論述旨在說明這樣一個問題，禪宗和近現代以來人生佛教的發展和廣泛流行，至少告訴我們：中國佛教的發展，應該而且必須走肯定現實人生之價值和意義的道路。

如同人生的價值取向對於現代佛教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一樣，對於出世、入世問題的態度，也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現代佛教的命運。

中國佛教之所以一千多年來能經久不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它能較好地處理

了佛法與世間法的相互關係。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佛教的成功之處有二：一是適當地調整了佛教與中國傳統的倫理綱常的相互關係，使得佛教非但不與封建倫理綱常相悖，而且能佐教化、益國治。例如隋唐之後的中國佛教非但大講孝道，而且「勸臣以忠，……勸國以治，勸家以和。」（李師政：《內德論》）其二是中國佛教能夠善於隨順世法之需要，既講「治心」，也講「治世」，把佛之「治心」與儒之「治世」合理地統一起來，此誠如宋代名僧契嵩所說的：「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禪津文集》卷八《寂子解》）這樣，佛教非但無損時政，而且有益國治。

如果說中國佛教的其他宗派在出世、入世問題上多表現於某些較具體的觀點和實際的做法，那麼，禪宗在這方面則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它已不局限於某些具體的觀點或做法，而是作為自宗的一個基本思想。而禪宗思想的這一轉變，也是以「六祖革命」為標幟，此誠如玄覺在《永嘉證道歌》中所唱的：「游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為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也就是說，在惠能之後，禪宗才真正做到把生死與涅槃，出世與入世融為一體，而也只是在這個時候，禪宗才得到長足的發展。

能否處理好佛法與世間法、出世與入世的關係對中國佛教發展的至關重要性還可以從近、現代中國佛教發展的曲折過程得到說明。

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原因，中國佛教進入近代以來——正如有些佛教學者所指出的——是「最黑暗的時期」。此一時期的中國佛教界，除有少數僧人、居士仍在為了「延續慧命」而進行不折不撓的抗爭之外，整個中國佛教「幾乎是剩下空白的一頁」（無言法師語）。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什麼呢？著名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和深入的分析。他認為，佛教所以衰落到這步田地，主要原因之一，是許多僧徒或隱遁潛修，或賴佛求活，佛教不但不關心社會，介入生活，相反地與世日隔，佛教自佛教，社會自社會。佛教冷落社會的結果，是社會也冷落了佛教。

嚴酷的現實使得當時的佛教思想家們深刻認識到，如果不對這種離世、避世的佛教進行一番徹底的整頓和改革，佛教之生存已成問題，又遑論發展。因之逐漸出現了強調把佛法與世間法、把出世與入世統一起來「人間佛教」的思潮。而近現代以來中國佛教的「起死回生」，也證明這種佛教思潮是適合當時中國的國情，是既契理，又契機。

這裡人們碰到一個問題，即中國佛教到了近現代之後，為什麼會選擇「人間佛教」之路？下面擬從思想文化背景的角度，對此作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討。

談論佛教發展的思想文化背景，自然要提到儒學。儒家思想概括地說，有兩大特點，一是注重「人本」，二是強調「入世」。如果把禪宗和近現代的「人間佛教」思想特點也

做一個概括，人們可以發現，注重「人生」和強調把入世與出世統一起來，同樣是二者的共同特點。這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可以這麼說，隋唐之後出現的禪宗，乃至近現代以來出現的「人間佛教」，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在儒家思想為主流的文化氛圍中形成的。

以近、現代人間佛教創始人之一的太虛大師為例，他的思想就深受儒家學說的影響。據有關資料記載，太虛其人，對於《四書》、《五經》、《老》、《莊》、《荀》、《墨》乃至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太炎）之書無所不讀，深諳中國傳統文化之底蘊，對於儒家的倫理學說，尤為精通並深表讚賞，認為，中國二千多年來文化之主流在儒，「屢言中國文化之特點，在於本人情為調劑之人倫道德。」（《附書仇張二君談話後》）且一再指出，儒家這種倫理學說與佛教的思想不但毫無「間隙詆排之端」，而且是遙相契合、甚至是「水乳交融」的，因此，「孔學與佛學，宜相嘉尚，不宜相排毀」。（《整理僧伽制度論》）

在太虛的許多著述中，反復強調這樣一個基本思想，即孔子是人乘之至聖，儒學可以作為佛學、特別是「人間佛教」的基礎，並且認為，儒學是中國二千年文化的主流所在，所以在中國「不得不行此人生佛教」。同時，這種以儒家倫理學說為基礎的「人間佛

教」，「亦最適宜為各國倡」，諄諄告誡西行學人，應該把中國文化之人倫道德「披四海」、「垂天下」。可見太虛對於儒家道德之學的讚賞和推崇。

如果說近、現代人間佛教之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是佛儒交融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說已是不爭的事實，那麼，現在更重要的問題也許還在於，為什麼這種佛儒交融的佛教，能夠成為唐宋以來中國佛教的主流？

要回答這個問題，也許得首先回答儒學何以在中國古代幾千年能久盛不衰？何以能成為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主流？考諸中國古代諸子百家，儒家只是其中之一支，其歷代之代表人物並不見得比各家高明多少，其思想也不是特別精深博大，體系亦非特別嚴謹，但是，他們有一個最大的長處，即適應時勢，符合國情，所提出的主張，能夠適合時代的社會歷史條件，這也是儒學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唐宋以來，禪宗所宣導的人間佛教和近、現代以來的人間佛教亦然，他們的思想雖然不像天台、唯識、華嚴等宗派那樣博大精深，也沒有非常宏大、嚴謹的思想體系，但它卻能為廣大民眾乃至士大夫所接受，能為當時的社會所接受，此中之根本原因之一，是因為那種佛儒交融的佛教思想能符合當時的社會需求，從而為它們的流行和傳播奠定了基礎，這種現象再次說明，「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取決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程

度」。

當然，說人間佛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絲毫不排斥人間佛教的思想源頭在佛陀，是遠承佛陀本懷的。釋迦牟尼所以創立佛教，其出發點就在人生，其所說之法，也是針對居住在這個世間的人生，不論是四聖諦，還是十二因緣，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在人生。就大乘佛教而言，人間佛教之注重人生，強調人間性，更與大乘佛教之關注世間，強調利他濟世的思想遙相符合，正因為這樣，儘管人間佛教與印度原始佛教在表現形式上也許會有這樣那樣的差異，但其本質並沒有變，都屬佛法。所謂「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此之謂也。

接下來談談第二個問題，即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為什麼會成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佛教思潮？

首先，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繼承與發展了近現代以來的人間佛教思想，並在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把人間佛教推升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

從思想層面上說，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繼承與發展了近現代以來的人間佛教的兩個基本思想，即注重人生和強調把出世與入世統一起來。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反復強調：「佛法是人生的學問」，認為「佛法的主要精神是提

高我們的人格」。同時，在處理出世與入世關係問題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更是向前邁進一大步，如星雲大師所提倡的：「在家容易出家難，出家容易出世難，出世容易入世難」，「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等，深寓哲理，耐人尋味！這種在入世中出世的精神，就是禪宗所說「三十年後看山還是山」的境界，也是禪宗「當下即是」、「立處皆真」精神的當代表現。

此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所以能在當代眾多佛教思想中顯示出其巨大的影響力，尤其在於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有一個最大的特質，就是善於用佛法去開啟人生智慧，從而實現智慧的人生，超越的人生。

「般若為諸佛母」。般若智慧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多元的、立體的思惟方法，這一點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且生動活潑。

星雲大師在其許多著述、講演中，經常用許多通俗易懂的小故事來闡發佛理，既深入淺出、形象生動，又讓人深受啟發、回味無窮，例如如何處理「捨」與「得」的關係、「放下」與「提起」的關係、「前進」與「後退」的關係、「生」與「死」的關係，等等。這種思惟方法，用星雲大師的話說，即是「一個人的思惟模式，不能只是單向的直線，要從前後、左右、上下、正反多方思慮，換個角度，往往就會轉圜出新機」。

其次，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其思想具有強烈的「內在超越」和「當下超越」特質。這主要表現為把「佛性」內在化為人倫道德，把出世精神融入到現實生活之中。這種精神與智慧，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把天道下貫到人倫道德」的思惟方法和人生境界繼續和發展！

再次，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另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把傳統的注重「求」的佛教，變成提倡「給」的佛教。主張「給」是「無上的修養，也是無上的智慧」。認為「即使是一個微笑，一聲問候，也是一種『給』」。提倡「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方便」。「給」和「求」相比，更是一種善因，更是一種善業，自然應得善果，會有善報。這種思想既與佛教業報輪迴、因果報應理論遙相符契，更充滿「正能量」，適應淨化心靈、提升心境，促進社會和諧的現實社會需求——而社會需求是作為一種精神產品的宗教能否發展及其發展程度的最終原動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就不難理解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何以會成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佛教思潮了。